

第六月

分歧从何而来？



分歧从何而来？

——答多列士等同志

《人民日报》社论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分歧从何而来？

——答多列士等同志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3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 · 字数 17,000

1963年2月第1版

196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1·713 定价（四）0.15元

在当前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逆流中，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同志和某些法共同志，扮演着突出的角色。

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下旬起，多列士等同志集中地发表了大量的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言论，还公布了大批有关的内部文件。其中主要的有：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多列士在法共中央全会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居约在法共中央全会关于国际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团结问题的情况报告；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共中央全会关于国际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团结问题的决议；

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居约为法共中央机关报《人道报》写的社论；

同日，法共中央机关刊物《新法兰西》周刊发表的题为《战争、和平和教条主义》的文章；

一九六三年一月五日——十六日，《人道报》接连刊载的十篇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文章；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新法兰西》周刊刊登的题

为《我們生活在什么时代》的文章；

一九六三年一月，法共中央出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問題》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收集了三年来法共某些领导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十五个文件，其中包括多列士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兄弟党莫斯科會議上的发言和他后来向法共中央全会所作的关于这次兄弟党會議的报告）；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五日，《人道报》刊載的居約写的文章。

这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言論的主要内容，本报已經在二月二十四日发表。从这些言論中，可以看到，多列士等同志在最近的反华大合唱中，在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竞赛中，特別卖勁，超过了許多攻击我們的其他兄弟党同志。

多列士等同志除了攻击中国共产党以外，还恶毒地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指責了朝鮮、緬甸、馬來亞、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日本等兄弟党，甚至还攻击了正在英勇地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他們誣蔑說，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什么“宗派主义和冒險主义”的立場，“已經在特別是亚洲的某些共产党內和在一些民族主义运动內得到了一些响应”，“滋长了这些党和运动中有时存在的‘左傾’主义”，等等。某些法共同志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所采取的这种态度，实在是令人

吃惊的；他們在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方面，实在是走得太远了。

中国共产党早就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必须而且应当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原则，在自己队伍的內部，通过平等的同志式的充分讨论和协商，求得解决。我們沒有首先发动对任何兄弟党的公开批评，也沒有首先挑起公开的争论。但是，誰要是利用我們这种以团结对敌的利益为重的正确立场，任意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以为不会受到应有的回击，那就打错了主意。

我們願意告訴那些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同志們：兄弟党的关系是平等的，既然你們公开地大肆攻击了中国共产党，那么你們就沒有权利要求我們不作公开的答复。同样的道理，既然你們公开地恶毒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那么阿尔巴尼亚同志就完全有平等的权利公开地答复你們。現在，有些兄弟党同志，一面讲要停止公开论战，一面却在繼續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进行攻击。这种两面态度，实际上是只許你們攻击別人，而不許別人回答你們的攻击。这是絕對办不到的。中国古語說：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們觉得，現在有必要郑重地提醒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注意这一点。

多列士等同志在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时候，讲到关于

我們时代的性质、对帝国主义的認識、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等問題。但是，任何人只要仔細看一看，就会发现，他們只是重复別人早已讲过的論点。对于他們在这些問題上的錯誤論点，在本报社論《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們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結起来》以及紅旗杂志社論《列宁主义和現代修正主义》这四篇文章中，已經作了回答，沒有必要在这里再来重复地討論。

值得指出的是，多列士等同志在他們的講話、报告和文章中，用了大量篇幅歪曲事实，顛倒是非，混淆視听，企图把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結、制造分裂的責任，强加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他們喋喋不休地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特别是中国同志們造成的”，分歧的由来是因为中国同志“实质上还没有接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論点”。他們还說什么离开第一次和第二次兄弟党莫斯科會議越远，中国同志的立場“离开他們自己贊同并投票同意的論点也就越远”。

既然多列士等同志提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歧的責任問題，那么我們就来談談這個問題吧。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歧究竟从何而来呢？

多列士等同志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沒有接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論点而

产生的。多列士等同志这种說法的本身，是違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規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則的。根据这两个共同文件，兄弟党的相互关系是平等的、独立的。任何人都沒有权利要求所有兄弟党接受某一个党的論点。任何一个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的決議，都不能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綫，对别的兄弟党都沒有約束力。多列士等同志甘心情願接受另一个党的論点和決議，那是他們自己的事情。至于中国共产党，我們一貫认为，對我們和所有兄弟党具有約束力的共同行动准則，只能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是兄弟党一致協議的共同文件，而不是任何一个兄弟党代表大会的決議或者任何别的什么东西。

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有它的积极方面，也有它的消极方面。对于它的积极方面，我們表示过支持。对于它的消极方面，即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些重大原則問題上的錯誤观点，我們历来是有不同意見的。我們在中苏两党会談中，在兄弟党會議上，都沒有隱蔽自己的观点，曾經多次明确地讲过我們的意見。但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們从来没有公开地討論這個問題，在这篇文章里也不准备討論這個問題。

事实很清楚，近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的产生，完全是由于某些兄弟党同志違反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協議的莫斯科宣言。

大家知道，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會議，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經過同志式的协商和集体努力，消除了兄弟党之間的某些分歧，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前的重大問題，取得了一致的意見，制定了莫斯科宣言。这个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綱領。所有的兄弟党都宣布接受这个綱領。

只要所有的兄弟党在实践中严格遵守而不違反这个宣言，那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就会得到加强，我們的共同斗争就会得到发展。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會議以后，在一段時間里，在反对共同敌人、首先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斗争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結战斗是比較順利的，也是有成效的。

但是，由于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屡次企图把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決議置于各国兄弟党的共同綱領莫斯科宣言之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內部的分歧。特別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戴維营會談前后，某些兄弟党同志，在关于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許多重大問題上，发表了一系列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和違反莫斯科宣言的錯誤观点。

他們違反莫斯科宣言关于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的

科学論断，不断宣揚在帝国主义制度和人剝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还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存在的条件下，就“已經有现实可能最后地、永远地把战争从社会生活中排除出去”，就可以实现“沒有武器、沒有军队、沒有战争的世界”。他們当时还預言，一九六〇年“将会作为开始实现人类关于沒有武器和军队的世界、沒有战争的世界的宏願的一年而載入史册。”

他們違反莫斯科宣言关于依靠社会主义陣营、民族解放运动、国际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爭取和平的群众运动的联合斗争来防止世界战争的論点，把維護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大国首脑人物的“明智”上，认为目前时代的历史命运实际上是由个别“大人物”和这些大人物的“明智”决定的，认为大国首脑人物的会晤能够决定和改变历史的进程。他們說：“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說过，只有掌握大权的各国政府首脑才有能力解决最复杂的国际問題。”他們把戴維营会談說成是什么国际关系中的“新阶段”、“新紀元”，甚至說成是“人类历史的轉折点”。

他們違反莫斯科宣言关于美帝国主义“成为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成为人民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的論断，特別热中于頌揚美帝国主义的首脑人物艾森豪威尔，說他“真誠希望和平”，“真正希望消除‘冷战’状态”，“也像我們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

他們違反莫斯科宣言所指出的关于两种不同社会制

度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則，把和平共处仅仅解釋为意識形态的斗争和經濟竞赛。他們說：“必須努力使两种制度之間不可避免的斗争变成只是两种意識形态之間的斗争，变成和平竞赛——或者用資本家更容易理解的語言說——竞争。”他們甚至把两种社会制度不同国家的和平共处，引伸到压迫階級同被压迫階級、压迫民族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方面去，說什么和平共处是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完全脫离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階級斗争的观点，实际上借口和平共处而抹煞反对帝国主义和支持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政治斗争，抹煞国际范围的階級斗争。

他們違反莫斯科宣言关于美帝国主义力图“以新的形式給已經解放了的人民重新套上殖民枷鎖”的論点，鼓吹帝国主义能够幫助不发达国家的經濟达到空前的高漲，实际上否定掠夺不发达国家是帝国主义的本性。他們說：“全面彻底裁軍还会創造嶄新的条件，以援助一些目前在經濟上还不发达、而需要比較发达的国家給予援助的国家。即使把由于大国停止軍事开支而抽出来的資金一小部分用来幫助这些国家，也就能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經濟发展开创一个嶄新的紀元。”

他們違反莫斯科宣言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和各国工人階級的革命斗争是当代維護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的論点，把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

斗争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对立起来。他们虽然有的时候也说应该支持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但是又反复强调“在现今条件下爆发的战争必然会成为世界大战”，“一个小小的火星也能够引起世界大战”，反复强调要“反对一切种类的战争”。这实际上是对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不加区别，借口防止世界大战，反对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反对一切正义战争。

他们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存在着和平的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的论点，关于“统治阶级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论点，而片面地强调和平过渡的“越来越大的现实可能性”，说什么和平过渡“对于一系列国家来说，已经是现实的前景”。

从上述一系列的错误论点中，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帝国主义所固有的各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已经不复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莫斯科宣言应该废除了。

散布这些错误论点的兄弟党同志，不论用什么样的借口，什么“外交辞令”呀，什么“灵活性”呀，都不能掩饰他们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的原则，都不能推卸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分歧的责任。

近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就是这样引起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內部的分歧，又是怎样公开暴露
在敌人面前的呢？

多列士等同志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公开化的
起点，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六〇年夏天以各种文字出版
《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兄弟党內部分歧的公开化，并不是在一九六
〇年夏天，而是早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戴維营会談前夕，具
体地說，在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就开始了。在这一天，一
个社会主义国家，不顾中国方面多次說明真相和劝告，迫
不及待地通过自己的国家通訊社对中印边界事件发表了一
項声明。这个声明不問是非曲直，对中印边境冲突表示
“遺憾”，实际上指責中国的正确立場。他們还說什么
这是“可悲的”、“愚蠢的”。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到一
个資本主义国家的武装挑衅的时候，另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不但不指責发动武装挑衅的反动派，反而指責自己的
兄弟国家，这在历史上倒真是第一次。帝国主义和反动
派立刻觉察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存在的分歧，并且利用
了那个錯誤的声明进行恶毒的挑撥离間。资产阶级的宣
傳机器当时大肆宣傳說，这个声明是“飞往中国的外交火
箭”，声明的“口气有点像一个严峻的父亲冷酷地教訓孩
子放規矩点”。

在戴維营会談以后，有些同志竟然冲昏了头脑，越来
越放肆地对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进行了

一系列的公开攻击。他們公然誣蔑中国共产党企图“用武力去試試資本主义制度的穩固性”，“像公鸡好打架那样热中于战争”。他們还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誣蔑中国共产党在国家領導方面实行“冒險主义”的政策。

这些同志在长时间内，热中于宣傳他們的錯誤观点，攻击中国共产党，把莫斯科宣言完全置諸脑后。这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造成了混乱，使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有迷失方向的危險。多列士同志想必記得，当时法共机关报《人道报》竟然大肆宣揚“華盛頓和莫斯科之間找到了共同語言，和平共处的語言”、“美国发生了轉折”。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維護莫斯科宣言，为了捍衛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使全世界人民了解我們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在紀念列宁九十誕辰的时候，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偉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結起来》三篇文章。在那个时候，虽然我們已經被人攻击了半年多，虽然我們在文章中討論到那些違背莫斯科宣言的錯誤論点，但是，我們还是以团結为重，把斗争的鋒芒指向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

多列士等同志把我們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說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公开化的起点，是把事

实完全弄顛倒了。

一九六〇年五月，美国 U—2 間諜飞机侵犯苏联，四国首脑巴黎會議流产，我們本来希望那些曾經大肆宣揚所謂戴維营精神的同志，能够从中吸取教訓，加强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結，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但是，同我們的希望相反，在一九六〇年六月初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北京會議上，有些兄弟党同志竟然不贊成譴責艾森豪威尔，并且散布了許多錯誤观点，还反对中国同志的正确观点。特別严重的是一九六〇年六月下旬，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兄弟党会談中，有人竟然揮舞指揮棒，以突然襲击的方式，大举圍攻中国共产党。这种做法，粗暴地破坏了兄弟党协商解决共同問題的原則，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

多列士等同志說，在布加勒斯特会談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对苏共进行攻击”。但是，参加这次会談的同志們都很清楚，在这次会談中，阿尔巴尼亚同志並沒有攻击什么人，只是坚持了自己的見解，沒有服从指揮棒，不同意对中国的攻击。在那些把兄弟党关系看成是“父子党”关系的人的眼里，一个小小的阿尔巴尼亚竟敢違抗他們的指揮棒，真是胆大妄为，大逆不道。他們从此对阿尔巴尼亚同志怀恨在心，采取种种恶劣手段，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布加勒斯特会談以后，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同志

們，迫不及待地采取了一系列的嚴重步驟，施加經濟的和政治的壓力，以至不顧國際慣例，背信棄義，單方面撕毀兄弟國家間的協定和合同。這種協定和合同不是幾個，或者幾十個，而是幾百個。他們這種把思想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的惡劣做法，完全背棄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完全背棄了莫斯科宣言規定的社會主義兄弟國家關係的準則。這些同志對自己的這種大國沙文主義錯誤不但不進行自我批評，反而責備中國共產黨犯了什麼“單干”、“宗派主義”、“分裂主義”、“民族共產主義”等等錯誤，這難道是合乎共產主義道德的嗎？多列士等同志是明白事情的真相的，但是他們不敢批評那些真正犯了把政治、思想爭論發展到破壞國家關係的錯誤的人，反而指責中國同志“將國家問題與政治、思想問題混淆在一起”，這種不分是非、顛倒黑白的態度，才是真正可悲的。

從上述的這些事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會議以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分歧的加劇，完全是某些兄弟黨同志在一系列的重大問題上越來越嚴重地違反兄弟黨一致協議的共同路線、破壞兄弟黨兄弟國家相互關係準則的結果。

多列士等同志不顧事實、顛倒是非的做法，還突出地表現在他歪曲一九六〇年莫斯科會議的真實情況，攻擊中國共產黨“不贊同國際工人運動的路線”，給會議“造成困難的局面”。

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們不願意在这里談到这次兄弟党内部會議的詳細情况，我們准备在适当时机和适当場合說明真相，弄清是非。但是，必須指出，中国共产党恰恰是一九六〇年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的創議者。我們努力促成这次兄弟党會議的召开。在會議期間，我們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反对了某些兄弟党同志的錯誤观点，同时在某些問題上作了必要的妥协。我們同其他兄弟党共同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使會議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达成了一致的協議，发表了莫斯科声明。仅仅这些事实，就足以拆穿多列士等同志的謊言。

一九六〇年莫斯科會議以后，各国兄弟党理应根据一致協議的声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集中力量，共同对敌。一九六一年一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會議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的決議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終不渝地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原則，将如維護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一样，維護这次會議的声明，并且坚决地为实现这个文件所規定的共同任务而努力奋斗。”两年多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忠实地执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協議，并且为維護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但是，多列士等同志竟然攻击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六